

如何解釋習近平時期的政策變遷？ How to Explain the Policy Changes During the Xi Jinping Era?

書評：Esarey, Ashley, and Han, Rongbin (Eds.). (2024). *The Xi Jinping Effec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蔡 文 軒

(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員)

關鍵詞：能動者、政策變遷、習近平、結構、韌性威權

* * *

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在 2024 年，出版了一本有趣的論文集，書名為：The Xi Jinping Effect。該書由加拿大亞伯達大學副教授 Ashley Esarey（葉敘理），與喬治城大學副教授 Rongbin Han（韓榮斌）主編。該書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分析概念：習近平效果（Xi Jinping Effect），來檢視習上臺之後，中國在政治、經濟、社會，與外交等領域上的改變。兩位編者在前言提到，習近平效果的出現，來自於習對於各項主要政策的倡議。這些倡議的出現，可能受到中國在面對國內與國際局勢的影響，也可能是想改進胡溫時期，在施政上的一些缺失。本書的諸多章節，還比較了習近平施政與過去的不同，並對習時期的相關措施，進行評價和分析。

筆者認為本書雖然是一本論文集，但這些文章的討論井然有序，並構建了一個宏大的問題意識：那就是到底習近平效果的呈現，主要是透過他一個人的動機與人格型態所創造？還是，這是受到歷史發展的結構背景所影響？前者的討論，多聚焦於習近平的個人因素，例如意識形態。諸如 Timothy Cheek（齊慕實）在本書第二章討論為何習近平會出現不同於鄧小平改革路線的政策時，認為習近平借鑑了毛澤東在延安時期與建國之後的諸多整風運動，來推動習對於幹部的治理與政策實踐。Gerda Wielander 在第四章對於習近平如何強化幹部或群眾對於中共的信仰，鍛鍊「鐵」一般的意志，並眾志成城來實踐中國夢，進行討論。這些理念對於習近平在

治理宗教或文化統戰時，也發揮了效果。對於習來說，諸如「宗教中國化」等政策，是回擊西方諸國對於中國進行文化滲透的必要舉措。而習近平時期大幅度搞個人崇拜，也可以顯見其威權性的政治人格，他希望透過讓幹部與群眾感到害怕，來進一步對其畏服，這在 Musapir 的專章做了分析。

而結構因素的解釋，則強調胡溫時期的諸多政策，可能造成黨內幹部與民衆的不滿。習近平做為胡錦濤的繼承人，其路線受到歷史與政治結構的制約，而必需對此做出相對應的改變。在 Martin King Whyte 所撰寫的第四章，對於習近平如何降低中國民間的收入不平等，做了討論。他強調習近平透過扶貧等政策來追求共同富裕。他也預期在習近平邁向第三任期的階段，追求社會公平與平等的措施，會更為明確。而筆者認為，胡溫時期過於強調發展的路線，使得中國對於所謂「姓資姓社」與「做 / 分蛋糕」的爭論，趨向激烈。在這個結構的影響下，習近平的措施不能只視為是他個人對於社會主義的政治信仰，而是有社會需求面的因素，Alexsia T. Chan 的文章也反映出類似的觀點。作者認為過去所實施的城鎮化，對於農村移入城市的人口並沒有妥善的安排，因此在就業、福利，與教育等配套措施不足。而習近平在 2013 年開展的新型城鎮化，希望進一步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並鬆綁戶口制度。

個人與結構因素，有時後並非能截然二分。在 Deng Kai 等人討論「監控國家」（surveillance state），就可以看到這項政策既有習近平個人對於國家安全的重視，也有社會維穩的實際需要。而兩岸與外交關係也顯示出個人與結構因素的相互建構。在 Tony Tai-Ting Liu 對於兩岸關係政策的討論，以及 Brantly Womack 對於習近平外交「新常態」的討論，也可以看出這樣的端倪。兩岸關係與外交的政策，受到習近平對於軟實力、文化融合、戰狼外交等理念的影響，也承襲或改變胡錦濤時期的相關政策，諸如和平發展的路線。簡言之，兩岸與外交領域的政策激變，有習近平個人的因素，諸如想奠立其歷史地位或重返毛時期東西對抗的主軸；但也有結構性因素，那就是中國在歷經胡溫發展後，希冀將稱霸世界與實踐中華民族復興之目的，獲得更迅速的體現。

最後一章，是 Kevin J. O'Brien 的專章，標題就是「Understanding the Xi Effect: Structure versus Agency」。O'Brien 提出相當有見地的觀察，他認為我們在討論「習近平效果」時，要先定義習近平是一個因素（cause）或是一個效果（effect）？他不否定習近平這個因素確實出現了效果，但要區分到底是從能動性（agency）或結構（structure）的角度去觀察習近平效果。從能動性的層次分析，強調個人對於決策具有獨立性與自主性。在習近平對於強人政治的推崇與安排下，

他建立了更為差序性的領導體系，以及對於「習思想」等意識形態的做了確立。而結構的層次，則更強調習近平的主政，是鑲嵌在既定的政經體系下所做出的選擇。諸如，臺灣與中國國力的不對稱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增強，而促使中共對臺灣採取更強硬的政策；又例如，為了控制經濟發展之後，所產生的新興社會群體，習近平對於社會進行了更為全面的監控。

從本書的精彩討論，筆者認為我們或許可以去思索一個更大的問題：習近平的「新政」，究竟是透過他一個人的「神格魅力」來主導？抑或者，這是一個鑲嵌在結構因素，以及共黨體制演進的必然結果？無可否認的，在習近平主政後，他推動的諸多政策都與胡溫時期背道而馳。例如，對於任期制的廢除、權力集中、打擊民營企業，以及對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採取更為強硬的外交政策。許多學者認為這些現象與習近平的早年的個人經歷有關。例如，文革的創傷，早期在河北等地工作時的不順遂，以及即位初期受到江澤民等派系的鬥爭與威脅，導致他欠缺安全感，並尋求更接近「鬥爭」的方式來解決對外與國內問題。這是一個從個人，也就是習近平因素來解釋為何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與韜光養晦的路線，到了現今戛然而止。當然，這是一個極富有說服力的說法。學者從黨史與習近平生涯史的角度，去剖析現今中國政治的演變。

但個人因素的解釋，似乎忽視了「結構」的重要性。迄今中國的鉅變，有無可能是一群支持下的結果，而非僅僅歸因於習近平個人的權威與人格特質？在歷經江澤民與胡溫時期近二十年的高速發展後，中國似乎已經逐漸與西方市場經濟走向「趨同」（convergence）。江與胡都非紅二代，且出身技術官僚，或許社會主義歷史使命對他們來說，並不是這麼重要。但實際上，中共身為列寧式體制的政權本質，並沒有改變。而這二十年的快速發展，是江與胡盡可能避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於政策所造成的箝制，而取得的「成果」。但在胡錦濤時期，諸多問題已經叢生，諸如姓資姓社的爭論、經濟不平等的問題，以及2008年京奧之後，日漸強化的民族主義。這都成為了許多左派支持者，亟欲思變的沃土。

從反事實（counterfactual）的角度來推斷，是不是在2012年底，若非習近平取得執政，中國政治就不會走向現今的局面？當然，歷史發展沒有「如果」。但筆者想要提出來的一個思考，是結構因素是否會箝制「後胡錦濤時期」，中共領導人的施政，使得他們有一定的必然性，要走向吳玉山提出的「再毛化」路線？①

註① 吳玉山（2003）。〈習近平現象〉。載於吳玉山、寇健文、王信賢（編），《一個人或一個時代：習近平執政十週年的檢視》（頁5）。五南。

或許，如果由李克強或李源潮等黨內開明派主政，其「再毛化」的程度可能要比習近平來的輕微。但這不代表他們的政經路線就一定會走向更開明，甚至民主化的路徑。共產政權內部的體制與意識形態，使得其在經濟發展路線，以及對西方外交等兩項政策上，存在著難以徹底解決的矛盾。習近平這類政治強人的出現，可能只是讓這個遲早爆發的張力，提前出現。

而中共元老在選拔習近平擔任最高領導人的同時，並不是沒有想到權力制約的問題。同樣是紅二代的薄熙來，就是黨內原先規劃，用來箝制習近平的人物。一旦按照既定劇本來演出，2012 年底之後的中國高層政治，可能會出現類似 1980 年代，楊繼繩所稱的「雙峰政治」景象。習近平與薄熙來，可能會扮演鄧小平與陳雲的角色，成為黨內最有勢力的兩位領導人。高層政治決策，會走向協商與制衡的體系。但在 2012 年爆發眾所皆知的薄熙來事件，及其之後的權力鬥爭，讓這位受人矚目的政治明星，徹底退出政治舞臺。至此，習近平成為紅二代當中，支持左派路線的唯一領袖。在他的執政下，中國逐漸走向了與胡溫時期，截然不同的政策與路線。

最後，這本書給我們的另一個反思，是「習近平效果」即便存在，但其影響力是否會「人亡政息」？簡言之，這些效果是否有可持續性？此外，習近平善於透過毛式的運動治理與整風，其所建構的集權體系，即便有效率（efficiency），但可能並沒有真正的效能（effectiveness）。從各級官僚在「扶貧攻堅戰」出現的政績灌水，清零運動的資源浪費，以及清除所謂「低端人口」的極端做為，都可見習近平主政下的侷限性。總體來說，本書提出的「習近平效果」，是一個令人感到趣味盎然的分析概念，也激發了我們對於當代中國政治發展與變遷的思考。

（收件：113 年 11 月 25 日，接受：114 年 1 月 9 日）